

获取一宗全球眼热的矿产资源： 布基纳法索个案研究

昆廷·梅格雷特

位于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西南一带的这片农村地区,居民五方杂处,语言不同,文化源流各异,分别组合为各自的社会而四分五裂(Birifor, Dagara, Kaansa, Lobi),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该地就以富有金矿可资开采名声在外(Kiéthéga 1983; Moussa 1995; Perinbam 1988),而最近十年左右则成为新近投身采金行列的人们落脚聚居之所的首选。成千上万的西非采金移民在此地安家

昆廷·梅格雷特(Quentin Mégret)目前任教于里昂第二大学,他是人类学调研中心(CREA)的成员,目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米歇尔·克罗斯(Michèle Cros)。Email: Quentin.Megret@univ-lyon2.fr

定居,生动显示西非多个国家都能见到的掘金之地“国境内的边疆”(internal frontier)的活力(Gratz 2004)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矿业公司也相随而至,在当地开展大规模的探矿活动。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化过程,导致这一生产部门私有化,国家从此退出黄金的生产和销售领域,转而负责给私营厂家发放营业许可和执照。布基纳法索西南部农村地区矿产潜力丰富,为成千上万的采金者所占据而又向跨国公司开放,于是呈现出边疆地区的某些特征,而边疆地区(frontier region)这个概念则有助于研究这一现象,可以借以说明这个地区及其资源所处的境况。矿产财富属谁所有,归根结蒂是如何获取土地的问题,也是土地关系的问题;土地的地位如何,往往随着相关群体状况而变。一片土

地的边疆究竟如何划分,往往说法不一,有关的行为主体以及相应的权利要求也就非止一端。于是出现种种不同的要求、观点、逻辑,导致对立和争论。规范和法理根据都多

元化了,以这种情况为背景,许多有关人士纷纷依赖合法性资源对这一从边界到内容都还正在重新加以界定的空间提出各自的权利要求,其中包括采矿营地附近的居民和村庄的掌权者、采金者、经营管理手工

开采和黄金收购的公司、中央政府和地方上的代表,以及持有探矿许可的各色人等。寻求活动空间的谈判因此便成为紧张、不和乃至冲突的潜在来源。这一现象呈现的总体面目变动不居,内涵则牵涉政治、宗教、法律以及经济等方面,而又常因具体场合以及有关行为主体的情况而异。其特征如何,本文将运用边疆理论加以探讨。

边疆理论:从特纳到科皮托夫

边疆(the frontier)这一概念首创于特纳(Turner 1935),用于言说美国当年对其西部的开拓过程,为求适应其他的迁徙定居现象,后来经过多次修订。1987年,对文化史研究路径颇有偏好的伊戈尔·科皮托夫从特纳那里得到启示,创造了“组织间隙边疆”(in-

terstitial frontier)或“国境内的边疆”一说,借以指称一国境内出现的边疆化过程,其间汇集的种种特征,是传统非洲社会的重构和复现(Kopytoff 1987)。在科皮托夫看来,包括因劳动就业而发生的迁徙在内的人群流动总是导致族群身份的重构,过去和现在情况都是如此。这就赋予了移民(先来者后到者,两种人辩证相对)一种决定性的地位,特别是就非洲之系统地产生边远地区居民以及(成群结队地迁徙的)流动群体的动态构成这一情况而言。人口外流,居民迁徙,新到之处体制上一片空白,应当怎样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成为居民面临的现实困难。在作者看来,这些当地的流动既经常发生而又有多个方向,虽然规模较小,却也符合边疆的概念,而对非洲文化史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除了地理和人口两个维度的特征之外,科皮托夫言说的边疆还涉及机会、特别是经济和贸易方面的机会。作者在此却首先要赋予边疆以政治维度。人类社会总是要对和自己毗邻的土地上的政治制度的分量、合法性,直至要对其存在做出界定,有时甚而越界前往殖民而不问这些土地事实上是否早就为有组织的社会所占据。边疆总是因群体、社会、定居和认同身份之间的关系而孕育着强大的活力。2004年,肖沃(Chauveau)、雅各布(Jacob)和勒·默尔(Le Meur)为名为《他处》(Autrepart)的杂志编了一期专号,题为“治理人和资源:境内边疆的活力”,编辑意图正是要回访科皮托夫提出的边疆模型,看看它是否与当代南方地区农村社会的情况相适(Chauveau et al. 2004)。他们在导论中写道:“建构对资源的权利和资源获取,这一主题自然而然引导我们的思考从对境内边疆扩大到中间机构——国家的行政机关、发展机构、市场——它们都参与了当代的对人和领土的治理”(Chauveau et al. 2004, p.15)。本文以境内边疆理论为依据,论述推动这一复杂而且

还在不断地演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性质竞争场域的挑战。

流动采矿营地的出现和成倍增长

20世纪70年代,全球消费品市场上黄金价格急剧高涨,西非黄金“边疆”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与当时萨赫勒〔1〕地区遭遇的大旱灾合到一起,导致虽属现代、却非工业化的手工采金场地出现和逐渐增加。在布基纳法索,这一迁徙活动始于1974年(Carbonnel 1991, p.125)。流动的青年采金者和众多商家一起,离开了萨赫勒,发展出一片片流动的采矿营地,星罗棋布,甚至越过边境延伸到国外。就布基纳法索而言,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迅速流传推广到新的地区,有的学者称之为“高度流动的前线(frontline)活动”(Jaques et al. 2006, p.115),指出在布基纳法索“手工采金的前沿阵地如今正在朝南推进,大约每年前推50公里。这场流动沿着两个主要的轴心展开,一个向西南,一个向东南。凭双手采矿的矿工已经逐渐把这片乡野地区‘殖民化’了”(Jaques et al. 2006, pp.116-117)。

1998年前后,商家和采金者一起到达了西南地区(Werthmann 2003a, p.100)。2009年年末,仅在按照其主要城市而命名、距离科特迪瓦(Côte d'Ivoire)北部边境40多公里的康普蒂省(Kampti),金矿开采区估计就有五十来处。也是在2009年,矿业能源部(DG-MGC)一项估计称,此类矿场全国约达300个以上,从业矿工则超过20万人。2009年8

〔1〕 Sahel, 阿拉伯语,意为“沙漠之边”,撒哈拉沙漠南沿的一条宽广的半沙漠地带,跨乍得、冈比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布基纳法索等国境。

月,布基纳法索现任矿业能源部长在提供给报纸的新闻稿中把这一数字加以提升:“足有70万人直接涉足这一部门”(Ouedraogo 2009)。而2010年布基纳法索全国人口不过在1500—1600万之间,这就足以说明这一现象的分量。

第一个流动的采金者到达康普蒂城附近,是在1999年。这一年,距离马梅那(Maména)一个洛比人(Lobi)的小村庄大约几百码之处出现了第一个金矿。这头一个采金营地开张,是由于有几位这个行业的开拓者在这里发现了一股矿脉。¹不出几个星期,就有大量劳工从相邻的地区和邻国纷纷涌入这个新的矿场,这些人曾在其他金矿劳动,在相关的行业各有专长。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布基纳法索中部偏北高原的莫西族人(Mossi),他们成为在民族和语言两个方面均占优势的群体,说明摩尔语(Moore)何以广为通用,它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绝对人人皆知。属于莫西族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有时用“莫西化”(mossification)来说明这种移民活动被赋予的政治维度(Werthmann 2000, p.101)。2005年,距离马梅那几英里处发现新的矿脉,随后在弗弗拉(Fofora)兴起了另一片矿区。

边疆首先是一个具有特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特色的地区。格拉茨谓一处处采金营地是一个个孤立的点,虽然地处边远,实际上却是社会变化的热点(Grätz 2004);是一片片流动的空间,成倍增长而四处分散,随资源的有无而兴衰,因而生期短暂,强使人们迁移成习,过一种流浪的生活,用简单的技术开发黄金资源。营区居民的动机单一(随个体生活的具体情况而定)而往复(取决于较为全面的经济环境)。这些动机往往反映着西非当代青年人遭遇的许多困难。然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许多年轻人之所以参加这一活动,时间长短往往不定,是因为喜欢

旅行和冒险(e.g. Bredeloup 1999, p.173; Kivilu 2000, p.129)。

格拉茨(Grätz 2004, p.137)举出了下述典型特征:成群结队迁徙到其他乡村地区;使得原来只是部分融入市场经济的当地经济面貌迅速发生变化,出现导致发生社会变化和竞争政治的间隙空间,以控制资源为焦点。特别需要认真考察的是以控制资源为焦点这一特征。也就是说,特别需要探讨某种资源如何参与以某个地方为中心建构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这一来就立即提出了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的问题。

占据产金空间,有若干先后步骤。这个行业的头几个先行者开始寻找金矿,最初只是来到这个地区反复来回行走踏勘,在当地西南一带遇到不同的情况,他们或是采取主动接触当地农民进行谈判,要求许可探矿,或是径自私下进行勘测。在康普蒂,流动掘金营地的出现在带来经济兴旺的同时也打乱了当地的土地归属权利,导致农民与采金者之间的许多冲突。一片理论上可供开发的土地,价值怎样评定并不仅仅根据技术性的描绘。边疆地区往往指荒野、无人居住的处女地,需要清除植被、砍伐森林。来到这里的矿工却发现,他们占据的这片土地早就已经社会化了,早就有人耕种。但他们认为他们的到来给这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所以他们的作为还是有理可说的。例如其中一位矿工就这么说:

起初,无论我们说什么洛比人都不肯听。你看见那条线(矿沟)了罢,那就是那条“嘎啦”线(“嘎啦”,洛比语,命令式:“给我走开!”)。我们刚来的时候,洛比人见着我们就赶我们,口口声声“嘎啦嘎啦”!所以才把那条线叫嘎啦线。洛比人如今醒悟过来了,明白我们的工作,知道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还跟我们一起干活(Gold miner from the gold-mining

site at Fofora, January 2008)。

人们依然感觉这些金矿工人头脑不怎么开化甚而“顽固”，特别是涉及在一片土地上修建房屋或者在业已占用已经有主的土地上进行某种活动必须举行的仪式和祭礼时。雅各布明确指出了“对自然的管理与对人的管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当地的诸多神灵（灌木丛的、流水的、狩猎的，如此等等）并不以控制自然资源为他们唯一的目的——那就未免太过于简单化了——为获取资源立下规矩，与此同时却也就与群体本身和与其他人的关系这两个方面设定了社会秩序（Jacob 2004, p.26）。人们普遍认为采矿十分危险，因而，为防止发生作业事故，牺牲献祭绝不可少（Mégret 2008; Werthmann 2003b）。虽然金矿矿工努力维系与当地人的关系，但他们心里的打算却总是短期的，因为他们在那里总是处于一种复杂而边缘化的地位，所以很少有人会打算在那里长期安家落户。矿工社群往往自成一体，不怎么积极参与周围村庄的日常活动。既然矿工有意自我成群，独立于东道主社区，当地居民也就难以把他们纳入当地的权利义务系统。如沃思曼所言，当地居民应对他们只有三个办法：不干预、谈判或者驱逐出境（Werthmann 2000, p.99）。金矿的头几位创业者当初曾从附近村庄请了中间人来帮助他们和当地社区打交道。按说这些中间人所处的地位使得他们能够预见和消解掘金者与洛比农民之间的冲突。但时间不过几年，情况就已经大有变化，如一位由农夫转变为采金矿工的洛比人所言：

他们告诉我，我这个洛比人，如果他们看见我在那里掘金，他们就杀了我。因为我就是那个把矿工领来的人，除非是洛比人，别族的人都进不去……我跟他们说，“看见钱了却不

去挣，白白走掉，这种事情我做不到！”我们总打架。现在呢，他们（土地所有者）明白这是好事了。他们骑上了大摩托车，我还连一辆自行车也没有挣出来。现在，他们一看见我就不好意思，每逢我路过，他们都眼睛朝地下看（Interview with one of the first Lobi gold miners, 22 July 2009, Galgouli）。

除了超越族群边疆与采金人建立关系之外（Grätz 2003），当地的中间人还应该知道一座村落的边界，确切识别种种特殊性质的地方，例如村里举行祭祀典礼及其影响所及之处，以及与其他村落的关系（洛比语称之为 *dii*）。产金场所附属于村子的 *dii*，与村神（*dithil*）的影响力范围相当。类此，空着的空间或灌木丛（*ban fan*）、特别是因为被灌木丛神灵（*kontee*）占据着而不得进入或危险之处（*pa sonse par* 和 *papu par*），都应该仔细地辨认清楚以免招来冲突。

采金者一旦发现一处矿脉，持有购买和出口黄金特许状的布基纳法索各家私营公司经理人等就得到通知，说“新矿即将开办”³很快，新矿的发现者就会与其中一家“公司”签订合同。布基纳法索矿业部门私有化之前，黄金采购和出口都由国家垄断，相应的垄断企业称为布基纳法索贵金属交易所（CBMP）。20世纪90年代实行私有化，该机构随之取消，原来的工作人员大部分转入私营部门。为求创造一种有利的气氛，机构改组和撤销都是逐步缓缓进行的。如今，小规模开采的黄金由大约十家持有“黄金购买和出口执照”的私家企业收购，其中一家公司名为萨沃（Sav'or），下设两大部门：生产和销售。

开矿之初，必须首先设立“贡普多瓦”（*comptoir*，即贸易站），这个名称是殖民时期留下的遗产（De Boeck 2001, p.551），一直流传下来，直到布基纳法索贵金属交易所都

已消失,它却还在使用。“贡普多瓦”由若干个规模不同的大棚构成,排列为长方形;采金人给金矿加工,必须在棚内进行,筛出的黄金原则上也才可卖给大棚所有者。这种安排,目的在于使矿石加工过程处于保密状态,由“贡普多瓦”的负责人以及持有黄金采购和出口执照的公司雇佣的保安监视。法律规定,要设立“贡普多瓦”,必须持有矿业能源部发放的“手工采矿许可”。得到许可的个人则通过签订合同与持有收购和出口黄金执照的公司联系,与涉及采矿业的方方面面建立关系。

为协调西南地区的业务,萨沃的生产部门雇用了一位被布基纳法索贵金属交易所辞退的人员充当“地区协调员”,一旦有“新矿即将开办”的通知,他就带着几个矿工助手到当地,然后对新发现的矿脉存量做出估计,起草一份情况报告,这是因为需要确定是否值得设立一处新的“贡普多瓦”,而这又尤其是因为要考虑新发现矿脉的位置。如有必要,他还要和村官、行政机关(警察、地区政府、市长)打交道。在有势力的采金者的支持下,“地区协调员”负责处置所有的行政、政治、土地所有权以及祭祀(奠基典礼)等等方面的的事务,破土动工,设立“贡普多瓦”。

“贡普多瓦”的设立,实际上赋予采金矿场以合理(非官方)或合法(官方)的属性。如果新发现的矿脉确有潜力,证明设置“贡普多瓦”确有根据,“地区协调员”就到位于瓦加杜古(Ouagadougou)的矿业能源部,理论上说,该处装备的全球定位系统可以确定新矿场的坐标值,以便申请“手工开采许可”。这种许可的效力有一定的范围,现行《矿业法》第48款规定:

许可传统手工开采的地面面积,应于许可中明确规定。有效范围应为1—100公顷,

呈正方形或长方形。

获得传统手工开采许可的企业,即应遵照矿业规章和现行惯例及时树立边疆标示和土地标示。如若虽然经过正式通知而边疆界限仍然没有树立标志,则矿业局有权代为树立而费用由矿场支付。标志边境界限的工作应当由注册测量员承担。

为获取这一“手工开采许可”,必须提交多种附件,其中包括向目标地区开发许可的“所有者”提出的一项正式申请。这是因为在当前这种自由化大环境中,布基纳法索西南地区很少有几块乡村土地不是早已由某个矿业“开采”许可所覆盖,或属于某家国际矿产公司,或甚至为当地企业家所有。萨沃在马梅那和弗弗拉两处手工矿场的代表就一直未能获得这项许可。

国际小矿业公司

按照科皮托夫的看法,非洲各国的边境都可界定为开放的空间,存在于有组织的社会之内,但属于边境地区的一个部分,可以称之为“内部的”或“间隙的”边境。边疆化过程绝对限于局部地区。市场发展、贸易自由化并且增长,外加相伴而来的各种流通都助长了间隙边境这一概念的形成。科皮托夫承认殖民地和后殖民地政策发挥了作用,但在他的理论中却将其重要性排除在外,而最为重视非洲内部——换言之,排除外部影响——的历史动因。就当前情况而言,矿业部门一经自由化,就把一个重大的外在的行为主体引入了获取矿产资源的政治竞争空间,使得边境理论从而更加复杂,因为这就牵涉到再度转向肖沃等人所说的“将特纳和科皮托夫两位提出的两种边疆概念合并起来”(Chauveau *et al.* 2004, p.16)。

按照通常的归类,采矿公司可以分为两

种。属于“小”公司的一类限于获取探矿许可、探测金矿，而所谓的“大”公司则是在矿藏确实已经找到、只待开采之际才立即出面，从政府部门取得“工业开采许可”。2010年的某个时候，应该会有6家工业规模的金矿运转了。康普蒂一家名为“沃尔塔资源”(Volta Resources)的控股公司，近些年来备受关注。该公司在多伦多交易所挂牌上市，专营西非贵贱金属；具体说来，是通过属下多家子公司在布基纳法索、加纳(Ghana)和马里(Mali)做买卖。公司总部在多伦多，阿克拉和瓦加杜古则分设办事机构。公司由两家其他的公司——“比林金场”(Birim Goldfields)和“戈德雷斯特资源公司”(Goldcrest Resources)新近(2008年3月31日)合并而成，它们此前就已经在西非(前一家1994年起在加纳，后者2000年在布基纳法索)致力于开发矿产。两家公司一经合并，沃尔塔资源公司就掌握了4125平方公里的开采许可，分为20处不同的矿场，遍布加纳和布基纳法索。沃尔塔资源公司也致力于通过在西非获取开采许可，在当地的探矿采矿行业中占据领先地位。⁵戈德雷斯特资源公司如今已改名沃尔塔资源公司，早在2002年便已在布基纳法索西南地区成立，拥有两家子公司：

加瓦矿业(Gaoua Minerals，加瓦是西南地区首府)持有开采许可，从事采铜。加瓦工程(Gaoua Project)覆盖了691.5平方公里。

温特沃斯金业(Wentworth Gold)，也百分之百为沃尔塔资源公司拥有。2004年9月获得康普蒂 III 许可，允许探测金矿，面积为244.5平方公里。

先来者，即早就在这个地区积极活动的人已经充分利用康普蒂 III 许可进行有目标的钻探，并且找到了若干含金的反常物质。

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过好几次转手。应该指出，合伙以及其他形式的合并都使矿业公司受到影响，而这种事也是常见的。基于康普蒂 III 许可的发掘于2004年正式开始。温特沃斯金业的活动包括钻探和试点，掘沟探测不同的含矿地点。根据位于矿场中心地带的两个洛比人的小村庄，两处作业分别称为马梅那和弗弗拉工程。这并非出自偶然，在本地区，迎接金矿工人到来、开办了前两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非工业化采金营地的正是这两个村庄，从而引发了“手工”采金的浪潮，新的工人一波随着一波相继而至。在这个地方，专门从事探矿的小公司平时不起眼，但在“大力开展钻探运动”期间例外：这时往往需要雇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2500—3000中非法郎(CFA francs)、相当于4—5欧元一天，活计十分辛苦。对受雇前来干活的三十来个年轻人来说，这笔偶然的工资在当地确实像天上掉下来的钱。不过，他们也承认其实挣不了几天工资，一年平均下来无法养家糊口，不成其为可靠的生活来源。但他们仍然怀着希望，兴许有朝一日能够得到长期雇用，这特别是因为可能会有大公司要来开采这个刚刚发现的金矿。

金矿工人、布基纳法索矿产经营者、矿产开发公司

矿工与本国或跨国矿产公司之间形成的关系远不止是小规模开采与大规模开采之间的差异性(Hilson 2002b) 因为这些范畴远非一致，出入甚大。按照沃尔塔资源公司派驻当地负责处理与手工开采矿工关系的经理的说法，持有许可的萨沃公司是获得了授权的，如果不是书面的许可，至少也是口头的许可；当然，也有某些条件。根据先来先得的原则，提出优先获得手工开采许可

的要求。为持有康普蒂 III 许可的矿产开采项目做探矿的温特沃斯金业的一家子公司表示将会“容忍”那些此前已经存在的采金场地,但不发给正式授权证书,防止采金者今后必须离去时高额索赔。温特沃斯金业的经理也提及由于场地上有采金者而给沃尔塔资源公司造成的不良影响。换一个角度看,采金者的频繁出现,却也很能表明有相当之多的金矿存在,从而证明这一特许的价值(Luning 2008a, p.393)。

在温特沃斯金业的出资及委托下,就“金矿开采场地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了一项研究,借以迫使采金工人接收调查获得的结果,提醒因他们而造成的问题。温特沃斯金业按照自己的逻辑,同意就它认为最不重要的地点发给若干开采许可。进一步,这家矿业公司有意只雇用有限的几位中间人,从而把其他的布基纳法索私营公司排挤出局,以免它们和自己竞争。要获得手工开采许可,最后还有一条:要和该公司在当地掌握开采许可的代表人物维持战略关系,服从一系列要求,博取他们的好感。为求适应这一局面,投资手工开采部门的本国私营企业家不惜代价,争取探测许可,许可一旦到手,就意味着在它所载明的范围内他们可以不受干涉地手工开采,而且对在该场地以手工开采的黄金,他们有垄断购买之权。这样一来,这些买卖人就可以要么把许可卖给有资本进行地面探测的外国公司,要么跟它们合伙。理论上,如若探测许可持有人未能付出一定的开支,保证所获得探测权利的土地优化增值,则矿业部有权收回它所发给的探测许可。最后,手工采金者都被迫听从持有购买和出口黄金执照的矿业公司以不同程度的压力执行的组织条例,事情也就如下述老矿工的辛酸之言:

你天天钻在树丛里,天天遭罪,挣的钱还

是吃不饱。等你找到了矿脉,把场地清理出个模样,老板就来了,从瓦加杜古来到这里,开设车间。

矿工按克出卖黄金,当然挑选出价最高的公司而不过问它们的每一步骤。“老板”们的名声不尽相同,各家获有执照的矿业公司其实也是如此。

中央政府的作用

1984年,布基纳法索在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领导下实施农业和土地改革,从那时以来,土地被认定为国家专有财产。2003年矿业法称:

布基纳法索土壤和下层土壤中蕴含的矿物物质,依法为国有财产。国家保证予以开发,其中包括号召私营部门遵照现行法规积极参与开发。

20世纪90年代实施矿业部门自由化,把国家在这个领域的角色重新加以界定,设置了一套较为灵活的法规框架,以期利于吸引外资。《布基纳法索矿业法》于1997年和2003年进行了修订。⁶最新版本开宗明义,第一款就在这个方面说得甚是确切:

本矿业法规的目的,在于促进对布基纳法索矿业部门的投资,培育和鼓励为布基纳法索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矿藏资源探测和开发(LOI No. 031-2003/AN)。

此次修订较为明显的效果之一是,对布基纳法索的矿产资源潜力感兴趣的外国公司愈来愈多地涌入这个国家,而政府失去了垄断本国矿藏探测、开采和销售的权利。特纳描述的边疆化过程具有极端强烈的民族

主义和意识形态特征,而布基纳法索的历史和政治环境却与之——殖民地国家以及经过改造的后殖民主义国家建立之前曾有过多个群集——格格不入。西非的情况在人类学文献中有广泛的描述,那就是源自十分清晰的民族历史的以法律和规范界定的多元主义(Chauveau *et al.* 2000, p.148)。

与特纳介绍的北美模型不同,关于边疆的最重要的时期不再必然是意在治理、授予产权和土地权利的政府到来之前的那段时期。在当代,由于它不再有能力保证开放和开发国土,政府就在国际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逼迫之下向外资开放领土,把发展国家经济的责任转托给跨国公司,而这时其他的社会动力已经导致了多种边疆化过程。有一个问题依旧突出,那就是国家主权是否仍然保持一份合法性。国家把种种不同类型的特许和授权给予种种经济法人(本国和外国公司),涉及探测、开采、销售、出口等方面。中央政府于是在土地分配方面扮演着一种独特的角色。所以,控制本国领土仍然是国家的日常工作,但就矿业部门而言,要开发矿藏如今却是依赖“私人积极主动”。虽然国家并不直接部署边疆化过程,而是在所谓的“手工作业”部门中相互竞争的各方——本国、国际、跨国以及私营的等——之间充当关键性的调停者。各种许可还都得由它发给,因此,布基纳法索政府仍旧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Luning 2008a, p.399)。

人们通常有一种看法,以为自由化过程会把政府变成旁观者,处于消极地位;事情恰恰相反,政府如今当起了裁判员,充分参与各种势力的相互作用。这一矿业政策终于把非工业化的开采排挤出去,它当然比不上“现代的”探测开采;人们认为唯有后者才有潜力,才有可能设想由跨国公司投资,进行工业化的开发。这种有时还带几分进化论色

调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意味着对(从事手工开采的)矿工的排斥,申请许可时把他们推到一旁,将他们边缘化,但凡富矿他们就难得有份。有些本国的企业家极其富于政治技巧,或是想方设法自己弄到勘测执照,或是与规模较小的勘测公司结成种种不同的战略联盟。它们发挥各自的政治影响力,最为关心的是跟本部门中富有政治影响的人物搞好关系,毫不考虑矿场上辛勤劳动的矿工。矿区附近一带的居民和社区全部被排斥在这些决策的势力范围之外。以土地所有者为例,地位就不牢固,当地居民根本没有办法施加影响,保证他们的权利不受侵犯。

结 论

布基纳法索政府最新的一系列声明,听起来更像是些口号:“布基纳法索矿业部门必将成为国家发展的引擎”,或是“布基纳法索是矿产潜力之国,必须迅速成为矿业之国”。在一片投资热潮中,布基纳法索政府矿业政策采取的一种做法是通过媒体大办宣传活动,例如2009年12月1—4日在首都瓦加杜古举办的第四届“蒲罗明节”(“Promin event”,其中“promin”为英语“mining promotion〈矿业宣传〉”的缩写)。“蒲罗明节”以“开发与可持续发展:采取什么战略?”为主题,其中尤其着重以下几个方面的讨论:

- 采矿业对战胜贫穷的贡献
- 对当地社区利益的考虑
- 环境问题
- 采矿后的行动

第四届“蒲罗明节”大大展示了为加强国家的合法性的可贵意图,体现着作为世界银行的一位“好学生”的动人形象,而布基纳

法索的媒体则就此种种广为报道和宣传。与此相类似而值得提及的是,2007年以来,布基纳法索还是“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TTI)的候补成员国。为求成为正式成员,必须首先成为守规矩的会员,布基纳法索就得采取种种措施,保证在2011年5月14日那天得到批准。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布基纳法索领土上持有其他探测执照的沃尔塔公司,新近吸引了负责与私营部门往来的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际金融公司(IFC)的注意。该公司的一大任务就是促进认为可以减少贫困、改善社区生活状况的称为“可持续性的”私人投资,例如为尚处于可行性之前阶段的矿业项目提供金融支持。2009年12月,国际金融公司派出一个工作组到布基纳法索,查看由沃尔塔资源公司提出的一项投资项目。有关的信息(出于透明度方面的考虑,已由国际金融公司在网站上公布)如若可信,那就已经和公司在当地的人员以及附近社区和采矿工人、特别是和康普蒂探测区的人举行了谈判,并提出建议:国际金融公司有可能给沃尔塔资源公司的探测活动投资800万美元,条件是后者将项目继续推进,从而为改善当地居民的生计做出贡献。⁸人们只能希望政府将会做出真正的努力,把“蒲罗明节”宣传活动中所宣讲的那些东西一一兑现,世界银行拨给小规模矿业公司的

投资也能顺利发放。加上由于布基纳法索的政治和经济局势而新近发生的这些事件,已经将这一领域当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囊括在内了。与此同时,如何保证采金者和当地社区以更为体面的、可以接受的方式参与关于布基纳法索即将发生的变化之变化的辩论,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Andrew 2003, p.128; Ballard and Banks 2003, p.306; Hilson 2002a, p.72; Tschakert 2009, p.733)。更进一步说,人文科学研究者对这一类型事务在这种情况下的批判性参与的问题,同样也没有解决。德·伯克新近述及安哥拉(Angolan)盛产钻石边境地区的政治经济属性之时曾经提出,要将科皮托夫的边境地区概念加以扩充:“时间已经到了21世纪之初,重要的一点是再次更动这个概念,把当地、边境地区以及外部动态关系一并纳入全球性的流动状态来考虑”(De Boeck 2004, p.95)。必须跟上当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不断修订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若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问题更加重视,科皮托夫的命题将会继续有效,通过协调赋予这些现象以全球属性的当地和全球性维度,与边疆化过程合并起来考虑。

[陈 思译]

注释

1. 矿工从事在矿脉探矿的工作,各种技术手段让他们能从30—40米深的岩层中提取出金子来。
2. 就传统而言,洛比人的社会并没有一个中心权威,这样的社会被描述为一个“无首领的社会”(De Rouville 1987)。
3. 金矿的矿工间有一套复杂的行业俚语(Cros and Mégret 2009),比如,他们用“线条”(line)指代延续的矿脉。
4. 此处的助手指的是受对“贡普多瓦”有控制权的采金公司雇佣的员工,他们是有经验、受“贸易站经理”信任并与之关系密切的矿工。
5. 相关信息可以从沃尔塔资源公司的网站获取 <http://www.voltaresources.com/s/AboutVolta.asp> (于2010年11月22日登录)。
6. 自2009年以来,布基纳法索矿业能源部在一些场合公布《布基纳法索矿业法》的一种新修订版本,在全面共同管理的框架下,修订版的草案旨在赋予地方当局更重要的地位。
7. 正如路宁(Luning 2008b, p.203)指出的那样:“政府与企业 在公众经常接触的媒体中的曝光率,与其实际上的‘虚拟隐形’形成了鲜明对比。”
8. 在文章的最初版本完成之后,国际金融公司最终同意为此项目投资400万美元。(http://www.ifc.org/ifcext/africa.nsf/Content/SelectedPR?OpenDocument&UNID=C7D18CEE254C3D49852576E7006CF077; 于2010年11月22日登录)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ANDREW, J.-S., 2003.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mediation to land use conflicts in small-scale mining”,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1, 117–130.
- BALLARD, C. AND BANKS, G., 2003. “Resource wars: the anthropology of mining”,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52, 287–313.
- BREDELOUP, S., 1999. “La fièvre du diamant au temps des colonies (Afrique)”, *Autrepart*, 11, 171–189.
- CARBONNEL, J.-P., 1991. “L’orpaillage au Burkina Faso et au Mali”. In: É. Le Bris, E. Le Roy and P. Mathieu, eds. *L’appropriation de la terre en Afrique noire. Manuel d’analyse, de décision et de gestion foncière*. Paris: Karthala, 122–130.
- CHAUVEAU, J.-P., LE PAPE, M. AND OLIVIER DE SARDAN, J.-P., 2000. “La pluralité des normes et leur dynamique en Afrique. Implications pour les politiques publiques”. In: G. Winter, (coord.), *Inégalités et politiques publiques en Afrique*.

- Pluralité des normes et jeux d'acteurs*. Paris: Karthala-IRD, 145–161.
- CHAUVEAU, J.-P., JACOB, J.-P. AND LE MEUR, P.-Y., 2004. "L'organisation de la mobilité dans les sociétés rurales du Sud", *Autrepart*, 30, 3–25.
- CROS, M. AND MÉGRET, Q., 2009. "D'un idéal de virilité à l'autre. Du vengeur de sang au chercheur d'or en pays lobi burkinabé", *Autrepart*, 49, 137–154.
- DE BOECK, F., 2001. "Garimpeiro worlds: digging, dying and 'hunting' for diamonds in Angol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28 (90), 548–562.
- DE BOECK, F., 2004. "La frontière diamantifère angolaise et son héros mutant". In: J. F. Bayart and J. P. Warnier, eds. *Matière à politique: le pouvoir, les corps et les choses*. Paris: Karthala, 93–128.
- DE ROUVILLE, C., 1987. *Organisation sociale des Lobi – Une société bilinéaire du Burkina Faso et de Côte-d'Ivoire*. Paris: L'Harmattan, 259.
- GRÄTZ, T., 2003. *Sharing and sustaining: the trusts of friendship among young artisanal gold miners in northern Benin (West Africa)*. Working Paper 54. Halle/Saal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
- GRÄTZ, T., 2004. "Les frontières de l'orpaillage en Afrique occidentale", *Autrepart*, 30, 135–150.
- HILSON, G., 2002a. "An overview of land use conflicts in mining communities", *Land Use Policy*, 19, 65–73.
- HILSON, G., 2002b. "Land use competition between small and large-scale miners: a case study of Ghana", *Land Use Policy*, 19, 148–156.
- JACOB, J.-P., 2004. "Gouvernement de la nature et gouvernement des hommes dans le Gwendégoué (centre ouest du Burkina Faso)", *Autrepart*, 30, 25–45.
- JAQUES, E., ZIDA, B., BILLA, M., GREFFIÉ, C. AND THOMASSIN, J. P., 2006. "Artisanal and small-scale gold mines in Burkina Faso: today and tomorrow". In: G. M. Hilson, ed. *Small-scale mining, subsistence and poverty in West Africa*. Rugby, UK: Practical Action Publishing, 115–134.
- KIÉTHÉGA, J. B., 1983. *L'or de la Volta Noire. Exploitation traditionnelle: histoire et archéologie*. Paris: Karthala, 247.
- KIVILU, S., 2000. "A la recherche du paradis terrestre: Les Bana Luunda entre le diamant et le dollar", L'éthique du secteur informel au Zaïre-Congo. Séminaire, Tervuren, Belgique, 18 December 1997 *Cahiers Africains*, 45–46. Paris: L'Harmattan, 127–139.
- KOPYTOFF, I., 1987. "The internal African frontier: the making of African political culture". In: I. Kopytoff, ed. *The African frontier: the rep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African societie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3–84.
- LUNING, S., 2008a. "The liberalisation of the gold mining sector in Burkina Faso",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117, 387–401.
- LUNING, S., 2008b. "Gold mining in Sanmatenga, Burkina Faso: governing sites, appropriating wealth". In: J. Abbinck and A. Van Dokkum, eds. *Dilemmas of development.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their resolutions in modernizing Africa*. Leiden: African Studies Center, 12, 189–205.
- MÉGRET, Q., 2008. "L'or 'mort ou vif' – L'orpaillage en pays lobi burkinabé". In: M. Cros and J. Bonhomme, eds. *Déjouer la mort en Afrique – Or, orphelins, fantômes, trophées et fétiches*. Paris: L'Harmattan, 15–43.
- MOUSSA, B., 1995. "L'or des régions de Poura et de Gaoua: les vicissitudes de l'exploitation coloniale, 1925–196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28 (3), 563–576.
- OUEDRAOGO, F., 2009. "Suspension des activités d'orpaillage en saison pluvieuse: Le ministre Kader Cissé veille au grain", *Sidwaya*. Available at: <http://fr.allafrica.com/stories/September2011>.
- PERINBAM, B.-M., 1988.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traditional gold mining: the western lobby, c. 1850 to c. 1910",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29, 437–462.
- TSCHAKERT, P., 2009. "Digging deep for justice: a radical re-imagination of the artisanal gold mining sector in Ghana". *Antipodes*, 41 (4), 706–740.
- TURNER, F.-J., 1935.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 WERTHMANN, K., 2000. "Gold rush in West Africa. The appropri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non-industrial gold mining in south-western Burkina Faso", *Sociologus*, 50 (1), 90–104.
- WERTHMANN, K., 2003a. "Ils sont venus comme une nuée de sauterelles – Chercheurs d'or au Burkina Faso". In: R. Kuba, C. Lentz and C. N. Somda, eds. *Histoire du peuplement et relations interethniques au Burkina Faso*. Paris: Karthala, 97–110.
- WERTHMANN, K., 2003b. "The president of the gold-diggers: sources of power in a gold mine in Burkina Faso", *Ethnos*, 68 (1), 95–111.

获取一宗全球眼热的矿产资源 :布基纳法索个案研究

昆廷·梅格雷特

十年左右的一段时期以来,有相当数量的西非采金移民流入布基纳法索西南地区。现代的非工业化采金作业分布甚广,现在已经形成一大片网络,覆盖本区多个地方。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压力,迫使布基纳法索政府实施采矿业自由化、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市场;从那时起,这一迁徙过程便已经在进行。如今,一家国际矿业公司持有康普蒂 III (Kampti III)的探矿许可。该地位于同名的省会附近,覆盖面积 250 平方公里,其中很大一片土地也为当地社区以及采金者所占有。在这一情况下,多个不同的持股人都在想方设法寻找种种法律依据,企图就事论事、逐个解决一片片土地及其包含的矿产财富的所有权问题。本文采用边疆理论(frontier theory),描述推动这一复杂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竞争场域的挑战。

[陈 思译]

集体记忆与对过去的管理 :战后黎巴嫩内战记忆的倡议者

艾尔萨·阿布·阿西

本文通过对战后时期记忆倡议者的研究及关于内战(1975—1990)的集体回忆的构成分析了黎巴嫩对过去的管理。在叙利亚霸权之下,战后国家的和解是基于对战争罪犯实行大赦及将民兵头目重新整合入国家机构中而开展的。聚集在“公民社会”旗帜下的记忆倡议者们通过动员人们寻找失踪者、开展纪念 1975 年 4 月 13 日的活

动、成立专门性的组织来争取在公共领域施加其对关于过去的阐释的影响。政府官员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使遗忘合法化,为了确保战后和解,对战争罪犯免责,使他们逍遥法外。作为回应,这些行动者从底层进行呼吁,提出正义与和解的民主要求。这个运动是由一些人权和倡议协会领导的,这些协会是国际人权网络的组成部分,国际人权网络旨在为终止全球范围内的战争提供指导。关于当地的记忆行为的研究突出了关于内战的记忆的不同叙述,反映了公民社会的冲突和内部分裂。

[胡锦涛译]

全球化与发展 :经典“依赖”理论与当今世界的关联

阿诺·陶施

30 年前,瑞士社会学家福尔克尔·伯恩施尔在本刊发表的文章中认为,跨国公司的长远效应——尤其是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较贫穷国家——明显是负面的。自那以后的 30 年间,新自由主义显示出一种回归的倾向:认为开放市场,外国直接投资和政府不干预是实现长期稳定经济发展和全面就业的理想的并且是唯一的良方。30 年后,在陷入了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经济衰退的世界中,伯恩施尔的论断仍然成立吗?在我们依照伯恩施尔 1980 年的文章而设计的研究中,跨国公司确实明显扩大了不平等并毫无疑问地促成了近期全球发展中经济增长的下降。

[项 龙译]

official and popular discourses described in the case study show that although nation states are obliged to compromise with supranational forces and institutions, the principal site of struggles to define collective subjectivities and positions is still located at national level. These struggles reflect the clash between the utopia of a homogeneous nation and that of a multicultural nation. This clash is the site of tensions and negotiations between three types of actors: international agencies, governing elites, and indigenous groups.

Gaining access to a globally coveted mining resource: a case study in Burkina Faso

Quentin Mégret

The last 10 years or so have seen a considerable influx of West African migrant gold-seekers into the south-west region of Burkina Faso. The modern non-industrial extraction of gold is widespread and at present accounts for a vast network of itinerant mine workings dispersed at many sites in the region. This process of settlement is taking place as pressure exerted during the 1990s by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as forced the State of Burkina Faso to liberalise the mining sector by opening up the country to foreign investors. An international mining company now holds the prospecting permit for Kampti III, located near the departmental capital of the same name. The permit, which covers 250 km², takes in a large part of the land also occupied by local communities and gold-seekers. In this context, a num-

ber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re attempting to redefine, often on a case-by-case basis and drawing on varied sources of legitimacy, ways of gaining access to the land and ownership of the mining wealth within it. This paper uses frontier theory to describe the challenges driving a complex and constantly evolving field of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Collective memory and management of the past: the entrepreneurs of civil war memory in post-war Lebanon

Elsa Abou Assi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in Lebanon, through the study of memory entrepreneur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a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ivil War (1975-1990), in the post-war period.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under Syrian hegemony is based on an amnesty for war crimes and the reintegration of militia heads in state institutions. Memory entrepreneurs, grouped under the banner of “civil society”, fight to impose their version of the past in public spaces, through the mobilisation for the missing, the commemoration of 13 April 1975, and the creation of specialised associa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government’s discourse legitimising forgetting, and to impunity adopted to ensure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these actors make the democratic demand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from the bottom. This movement is headed by human rights and advocacy associations. They are part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etworks which provide guidelines for ending the war at a global scale. The study of local memorial
